

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以 20 世纪 50 年代“余江血防”为个案的考察

万振凡 杨 文

血防之初，长期遭受“瘟神”摧残的疫区人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心存怀疑，认为新政权同旧政权一样，不可能医治好“华佗也难医”的血吸虫病。党和政府则把血吸虫病隐喻成“反动旧政权”，将血吸虫病的蔓延归结为旧政权反动统治造成的结果，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展示新政权优越性、建构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血防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优良作风，为新政权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新政权消灭了给疫区群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旧政权无可奈何的血吸虫病，极大地提高了疫区人民的健康、生产和生活水平，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关键词】疾病防治；合法性建构；余江血防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SX(2017)04-0160-07

万振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文，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22）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合法性建构问题，是近年来颇受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诸多学者开展过研究。如彭正德、王东明、王先俊等分别从思想文化宣传、经济建设、政治运动等视角，考察了新中国构建政权合法性问题，关注的都是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普遍做法。^①部分学者虽然注意到医疗卫生与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某种关系。如杨念群提出：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隐喻着中国国家的衰败，“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1]胡宜从疾病的政治隐喻出发，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进行了分析。^[2]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些成果都没有深入探讨疾病防治对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新中国在政权合法性建构问题上，除了采取常规的措施外，还采取一些特殊方法，如疾病防控，由于这些特殊方法，切合当时某些区域社会的现实需要，对政权合法性建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本文拟以“余江血防”为个案，对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之关系作一探讨，旨在为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县域范围的案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方地区疾病流行及血防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疾病横生，尤其在南方农村地区，气候潮湿闷热，蚊虫众多，更易于疾病产生，其中鼠疫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疾病杀手。“通过对 1900 年到 1949 年的不完全统计，建国前鼠疫曾波及 20 多个省、自治区的 501 个县、市，发病人口 1115584 人，死亡达 1028408 人。”^{[3] [p11]}南方的云南、福建、广东、江西、浙江等省份均大规模的爆发过鼠疫。李玉尚对近代云南、福建、广东地区鼠疫进行研究，指出：“从 1856 年到 1949 年，鼠疫在云南 84 县流行 93 年次，74 万人死亡；从 1867 年到 1952 年，在广东 69 个县流行 83 年次，48 万人死亡。在福建，从 1884 年至 1952 年，鼠疫波及 56 县，死亡人口达 71 万。实际上，这些数据是低估的，据调查研究，咸同年间云南战争核心区死于鼠疫的人口达 150 万。”^[4]除鼠疫外，天花、霍乱、麻风病等全国性疾病在南方地区也广为流行。

地方病中，血吸虫病被称为“瘟神”，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其中“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 12 个省（市）的 350 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 1 千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 1 亿以上”^[5]，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疾病。解放前，血吸虫病是绝症，华佗难医，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且以男性青年居多。人口死亡导致家庭绝户，农村变为“无人村”。新中国成立前 40 年内，仅江西因血吸虫病而死亡人数就达到 326656 人，五万多户家庭绝户，“无人村” 1315 个。^{[6] (p115)}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区的情况同样严重。此外，血吸虫病还导致疫区日益贫困，患者身体“病弱”且丧失劳动能力，妇女无法生育等多种症状。血吸虫病危害下的疫区成为“千村薅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间地狱。

面对严峻的疾病，部分新解放区群众首要考虑的不是土地等生活问题，而是更为基本的生命问题。开展广泛的疾病防治，拯救患者生命，改善疫区经济，也不失为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血防运动初期农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的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群众对新政权缺乏了解，加上血吸虫病具有难以治愈的特点，血防初期疫区群众对新政权的血防能力产生质疑，在行动上也往往消极应对。

首先是群众对新政权进行的血吸虫病宣传不信任。有些农民不相信钉螺是传染血吸虫病的媒介，他们说，害大肚子病是“吃了狮子岩的水，龙脉挖断了，地不发人，命运不好，生死由天”^{[7] (p48)}。为了让群众相信血吸虫的存在，血防站专门让群众通过显微镜来观看虫卵，但群众仍将信将疑，认为这是血防人员在变把戏，是变的，不是真的。^{[8] (p40)}即使有群众相信血吸虫存在，也普遍不相信新政权能把血吸虫病治愈。“他们认为血吸虫病在这里流行五十多年了，过去人民也想过办法，求过医，吃过药，却只见病人死，未见病人好；只见病人多，未见病人少。”^{[7] (p48)}血吸虫病患者也对新政权治愈血吸虫病不抱希望。早期病人不相信自己有病，晚期病人则认为“神仙也难治好，你们更没有办法”^{[9] (p20)}。

其次，在血吸虫病调查阶段，群众对调查工作也往往不配合。为了检查群众是否患有血吸虫病，必须进行粪检，当时粪检遭到了群众普遍反对。群众骂血防干部为“吃屎干部”，骂政府派来的血防医生为“屎医生”，他们拿牲畜粪便冒充给医生检查，或直接抵制，找干部麻烦。上黄村是余江疫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党和政府派医生到当地开展血吸虫病调查工作。当血防干部来动员群众接受粪检时，有很多人不配合的。例如上黄村黄露华不愿粪检，说什么“人都死到窟窿里来了，管他有病没病，还检检……检，检什么？要死就情愿死！”血防干部动员了他七八次，还是不肯去检查。^{[8] (p58)}疫区像黄露华这样的病人还有很多。

由于群众对新政权血防能力质疑，自然也不相信血吸虫病能被消灭，故认为血防没有必要且毫无意义，对参加血防工作表现出消极情绪。余江县地方政府动员群众去灭螺，群众不去。他们说：“快要死的人了，也该积点德，还再去残害生灵。”或说：“钉螺又多又小，等消灭掉，人也死光了。”^{[7] (p48)}或说：“钉螺面积太广，工程浩大，怕消灭不了，枉费心机，徒劳无功。”^{[9] (p20)}勉强参加的人也是应付干部，效果不大。

除了群众，许多基层干部也同样有此想法。他们认为县委制定出的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是“吹牛皮”，说什么“反正是党的决定，叫做就做，行不行谁知道。”^{[7] (p48)}干部思想觉悟比农民高，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可度亦高，但质疑声仍多，也从侧面反映出疫区大多数人对新政府血防能力的不信任。

疾病防治是新政权面临的重要考验，而新解放区群众对新政权血防能力的质疑，实际上是对中共执政能力及执政绩效的质疑，是新解放区群众与新政权间政治隔阂的具体体现。

三、疾病“隐喻”与新政权意识形态斗争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寄生虫”这一词就具有很深的隐喻作用,而且血吸虫病通过字面上来理解,它是依靠吸食宿主的血液为生的。血吸虫病患者往往骨瘦如柴,感觉像是被榨干了精血一般。血吸虫病也自然跟剥削、压榨等词义相挂钩。政治方面血吸虫病流行往往被隐喻为“恶政府”造成的恶果。^{[10](p288-291)}

新中国成立初,党和政府在开展血防宣传时运用了血吸虫病的这种“隐喻”,将血吸虫病与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相联系。丑化旧政权的形象,才能更好地突出新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意识形态活动的否定效果。“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11](p41)}这是新政权在余江疫区积极宣传的一首歌谣。歌谣把国民党和血吸虫病等同看待,将国民党隐喻为“瘟神”,是人民苦难的根源。宣传方式上也经常采取回忆、对比、诉苦等方法,从政治上启发群众,说明旧政府只知道剥削农民,对血吸虫病听之任之,使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农民深切关怀,领导我们同血吸虫病做斗争。只要大家听毛主席的话,血吸虫病是可以防可以治,可以消灭的。^{[12](p8)}通过疾病“隐喻”方式,一方面对旧政权进行否定、丑化,号召大家“与疾病做斗争必须首先同坏政府做斗争”^{[10](p291)};另一方面体现了新政权胜于旧政权,暗示了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造福,以增进群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王小军对 20 世纪 50 年代血防运动研究之后也指出,新政权提出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无疑暗含着这种象征意义,而这种隐喻功能有利于民众对新政权的产生亲切感、信任感,从而获得民众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10](p291)}20 世纪 50 年代,疾病诉苦等各种意识形态教育在疫区逐步展开,循序渐进,对普通民众起到了政治上的引导作用。据 1956 年 7 月 10 日不完全统计,仅江西余江县就有 8.8 万人受到了这种教育。^{[13](p50)}许多人在接受教育之后,流露出对新政权的感激,形成强大的认同聚合。

消灭血吸虫病是世界性难题,谁能够首先消灭血吸虫病也蕴含着浓厚的政治隐喻。1958 年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新政权开动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充足资金却对血吸虫病束手无策,而我国却可以在数年内就将血吸虫病消灭。官方通过这种方式向各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程崇圯教授是血吸虫病的专家,早年在日本留学,当看到了余江血防成效之后,也无不感慨地说:“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留学时,看见日本对于防治血吸虫病早已采取措施,并参观过他们的研究机构,直到如今,日本这一工作还没有获得成功。今天我们余江县获得了首先根除血吸虫病的光荣称号,从实践中充分证明血吸虫病是可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与血吸虫病做斗争的失败,不是证明血吸虫病不可战胜,正是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消灭血吸虫病的必要社会条件。”^{[7](p61)}此外,有人把资本主义隐喻为“瘟神”,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瘟神”的发源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瘟神复活”^[14],从而直接强调对瘟神的斗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一直贯穿于余江血防过程的始终。通过新旧对比、中外对比,血防达到了对新政权的肯定和强化群众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同的目的。

四、血防开展与新政权形象塑造

“执政党的形象,是指社会和公众对其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业绩、精神风貌等的整体看法。”^[15]中共自革命以来,一直将党的执政理念定义为“为人民服务”,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党员行为规范,通过实际行动塑造党员干部的“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形象。血防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破血防第一线,充当血防工作的排头兵,带领群众一起开展血防工作。1956 年初,在马岗乡进行灭螺试点,灭螺指挥部就直接设在灭螺工地上,干部和群众一起灭螺。支援弓塘乡灭螺的洋源乡民工,在乡长带领下天不亮就上工地,早中饭送到工地上去吃,连干三天二夜。^{[16](p59)}此外,县委书记李俊久和副县长吴早孙也亲临一线,抡起铁镐,同群众一起填塘。这跟旧政权官员形象大相径庭,群众对此无不惊叹地说:“世道变了,县大爷也不同了。旧社会的县大爷,出门骑马坐轿,前呼后拥,如今的县大爷,跟我们作田人亲哩”。^{[11](p89)}灭螺关键时期,邓埠镇还组织了机关干部等 1000 多人参加灭螺,支援普通群众。在群众传统思维中,政府干部高人一等,往往高高在上。新政权干部亲历亲为的形象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口碑。在余江血防过程中,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更是得到群众的高度赞誉,也树立了威信。干部与群众齐心血防,拉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建构起群众与新政权间的情感认同,并进一步上升为政治认同。

此外,新政权能够为群众着想,积极开展疾病治疗,挽救群众生命,对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群众视中共为“救命恩人”。血吸虫病被称为“瘟神”,华佗难医。针对疫区患者众多,医务人员紧张的问题,省、地区、县委、政府派出了许多优秀、专业医

生赶赴疫区农村。据统计，从 1956 年 3 月至 1958 年 3 月，省里先后派来四批 82 名省级医院医务人员，每批留县时间至少三个月。^{[17] (p65)}上饶专区也将其直属的血防站全部成员派赴余江县达半年之久。余江县也从各医疗卫生单位抽调 10 多名中西医务人员长期驻疫区工作，改变了医务人员紧张的局面。大批的血防专业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进驻疫区，进行防病治病。疫区人民感动地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命就有救了！”^{[8] (p53)}

倪桂乡西坂社社员金冬，不相信自己的大肚子病是血吸虫病，别人参加灭螺，他却在家休息，人家医病，他就吃斋念佛求菩萨保佑。结果别人一个个把病治好了，身强力壮了，自己却一天天严重起来，肚子越来越大，后来没有办法拍到血防站去治疗，病治好之后，回到家里当天就把菩萨打碎，堂前高高地贴起了毛主席的像。^{[9] (p38)}

疾病治疗中，新政权推行的许多措施解决了民生，得到农民的支持、拥护。针对农村治病问题，县血防站主动出击，组织治疗小组，深入农村，送医送药上门。医药费方面，实行收、缓、减、免政策，为大多数患者减免医药费。针对家庭生活困难户，余江县政府推行三大政策，一是乡信用社给贷款，如 1957 年春，马岗信用社给住院病人生活贷款 500 元；二是民政部门拨付救济款，1956 年县民政局给 179 名病人发救济款 552 元，人均 3 元多；^{[16] (p64)}三是治疗期间队里适当记工分，出院后照顾干轻活。据 1956 年上半年五个治疗组统计，收治病人 650 人，医药费全交（4 元）的 319 人，占 49.08%，减半交的 144 人，占 22.15%，免交的 187 人，占 28.77%。^{[16] (p63)}治病过程中，政府官员也常去看望患者，乡里社里经常杀猪、捕鱼、磨豆腐改善病员的生活。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解决了民生问题，也自然得到群众的高度赞赏和信赖。随着血防运动开展，血防成效的显现，新政权在群众中的“为民”、“恩人”形象逐步确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过程。

五、生产生活改善与农民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

“合利益性是政权合法性最基本的原则”。“如果没有对不同层面利益的满足，就不会有利益主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那么政治体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18]血防初期，新政权根据血吸虫病的特点，进行了政治隐喻化的宣传，通过血防行动塑造了新政权的良好形象，这些都是从情感认同出发来增进其政治认同。但农民也具有其理性化的一面，利益的保障和维护才是其政治认同的基础。余江开展血防运动与疫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

首先，血防治愈了患者，解放了劳动力。以前患者是“拿起锄头就想歇”，现在是“治好了大肚病，格外有精神，生产大跃进，浑身都是劲，一天干到晚，越干越有味”。邓埠镇马岗村农民黄生贵患病时，劳动无力，经常缺勤，1955 年做工分 1700，治好病后，1957 年做工分 2700 分。^{[19] (p599)}弓塘乡的潘厚发，患血吸虫病十年来，病势严重，劳动力减弱。1955 年治愈后，劳动力提高了，由以往 6 个工分增加到 9 分，成为夏收模范。倪桂乡的邓梅血吸虫病治好之后，每天的劳动工分也由 3 分提高到 7 分。^{[9] (p38)}这样的案例在疫区数不胜数。宏观看，通过治病之后，疫区劳动力数量、质量都得到提升，促进了生产，摆脱了贫困。如弓塘乡，根据 1955 年普查，结果患血吸虫病的占 45.92%，全社缺少劳动力 2000 个，需向外雇请工资预 2000 元，经过几年治疗后，1956 年的劳动力不但不缺，而且还多余。1957 年上半年，全社劳动力估计全年可多余劳动力 7000 多个，按现在每个劳动力为 1.30 元计算，全社可增加收入 9100 元。^{[20] (p38)}

其次，血防解决了疫区许多家庭的婚姻、生育问题，促进了疫区社会和谐。由于血吸虫病会导致妇女绝育，许多家庭因此而绝后，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育带来患者与家庭内部关系紧张。余江县开展疾病治疗后，妇女恢复了生育，生下了小孩，患者及其亲属欢欣鼓舞，无不感谢党和政府。如倪桂乡西坂农业社的邓汝梅，早年患了血吸虫病，无法生育，婆媳、夫妻关系紧张。血吸虫病根除之后，不久就生了孩子，全家幸福。邓汝梅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21]血吸虫病女性患者黄冬秀，结婚八年不生孩子，经过治疗后，去年生下了男孩，全家欢天喜地，感激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22]邓汝梅、黄冬秀也仅是余江县疫区千千万万血吸虫病患者的缩影。血吸虫病还导致了男性患者身材矮小，找对象困难。许多年轻姑娘也由于在本地找不到合适老公而远嫁。血防后，均找到了对象，生活变得幸福。“弓塘社社员黄得发，二十多岁病得像十来岁的小孩，没有妇女愿意嫁给他，治好了病，长得很快，最后与一个年轻妇女结了婚”^{[7] (p64)}。有些打了几十年光身汉

的壮年人，血防后也都有了爱人，有的生了小孩。原来许多女性被血吸虫病夺去了青春，病愈后也找了伴侣。年轻的姑娘们，如今再不为闹外嫁而苦恼，她们乐为和当地小伙子们谈恋爱或结婚。结婚生子本为人生大事。新政权通过血防，解决了人们的婚姻问题，使许多人过上正常生活，社会更为和谐，人们对新政权认可亦高。

最后，血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促进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农民对新政权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可。血防改进水利设施，粮食年年增产。疫区在 1956 年增产 18.4% 的基础上，1957 年提高到 23.8%，每年能向国家出售一百多万斤余粮。^[23]西坂农业社的杨家车村，以前穷困潦倒，有“好女不嫁杨家车”说法。现在是连年生产丰收，早稻平均亩产千斤以上。^{[7] (p46)}受当时环境影响，数据或许有部分虚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余江农业的增产。血防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也起到了良好的经济效果。为根除藕塘的钉螺，发明了“藕塘改鱼塘”新办法。消灭了钉螺，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原本种藕，其经济效益不足 500 元。1957 年变鱼塘后，产夏花鱼 150000 尾，每万尾 40 至 110 元，计 1050 元；产冬片鱼 88000 尾，每万尾 250 元，计 22000 元，总计 23050 元。除去成本、工资等，还盈利 13600 元。^{[20] (p38)}种植业上，推广陆稻，同时改进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且适当种植栽萝卜菜、薯、姜等高产作物，达到了血防、农业增产双效果。据全疫区人均纯收入调查：“1952 年 52.3 元，1958 年 78.9 元”。^{[19] (p600)}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新政权也自然更为拥护，这是群众基于物质利益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血防后群众说：“只要共产党发号令，干部能想到的，我们就能做到，你们只要扶好梯子，我们就敢上天”。^{[9] (p24)}余江县人民，面对着今天的幸福生活，都衷心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也普遍认为：“共产党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没有共产党就没今天！”^{[7] (p64)}农民对新政权表现出高度政治认可。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余江血防运动初期，农民对新政权的血防能力持质疑态度，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与疫区群众间存在着政治隔阂，新政权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得不到群众的有力配合。新政权在开展血防过程中，借用疾病的政治“隐喻”，开展意识形态建设，通过新旧政权、中外政府的血防成效对比，突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广大党员干部在血防工作中发挥优良作风，在疫区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了群众对新政权的信赖和支持；血防带来的一系列正向效应，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促进了社会和谐和生产发展，保障了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血防，疫区群众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性上，都增进了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疫区群众也发自内心的表达出了对新政权的感激之情。总之，疾病防治达到了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效果。

注释：

① 参见彭正德 《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王东明 《建国初期新政权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资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 年第 2 期）；王先俊、胡倩燕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黄志高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王健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新解放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方法（1949-1952）——以沪郊土地改革为视角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龚浩然 《建国初期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建构与启示》（河南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杨念群. 再造“病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胡宜. 疾病、政治与国家建设[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
- [3]纪树立. 鼠疫[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
- [4]李玉尚.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 — 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J]. 历史研究, 2002 , (1) .
- [5]毛泽东. 送瘟神·诗二首[N]. 人民日报, 1958-10-03 .
- [6]《江西省卫生志》 编纂委员会: 江西省卫生志[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7 .
- [7]送瘟神纪实[Z]. 余江: 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 2011 .
- [8]余来喜. 余江血防史简介[A]. 余江县文史资料(第 1 辑)[Z]. 1985 .
- [9]中共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 余江县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8 .
- [10]王小军. 疾病、社会与国家: 20 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
- [11]邹华义. 跨越死亡地带[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 [12]余江县档案资料汇编之(二). 送瘟神第二辑[Z]. 南昌: 江西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111 - 2-343 .
- [13]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 [Z]. 余江: 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 2012 .
- [14]江西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站. 在毛主席 《 送瘟神 》 光辉思想指导下前进 — 余江县是怎样巩固和发展血吸虫病成果的[J]. 中国科学, 1975 , (4) .
- [15]李金铮. 以民为本: 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J]. 河北学刊, 2015 , (3) .
- [16]余江血地防志(1953-2010) [Z]. 余江: 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 2011 .
- [17]江西省余江县血防志[Z]. 余江: 中共余江县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4 .
- [18]赵海立.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框架[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 (5) .
- [19]江西省余江县志编幕委员会: 余江县志[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 [20]张锦. 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1957. 7. 30-1957. 8. 10) [A]. 余江县档案资料汇编之(二)· 送瘟神第二辑[Z]. 南昌: 江西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111-2 -343 .
- [21]陈秉彦, 刘光辉. 第一面红旗 — 记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N]. 人民日报, 1958-06-01 .
- [22]程崇圯. 世界医疗史上光辉的一页[N]. 江西日报, 1958-05-31 .
- [23]江西日报社论. 祝余江人民根除了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N]. 江西日报, 1958-06-01 .